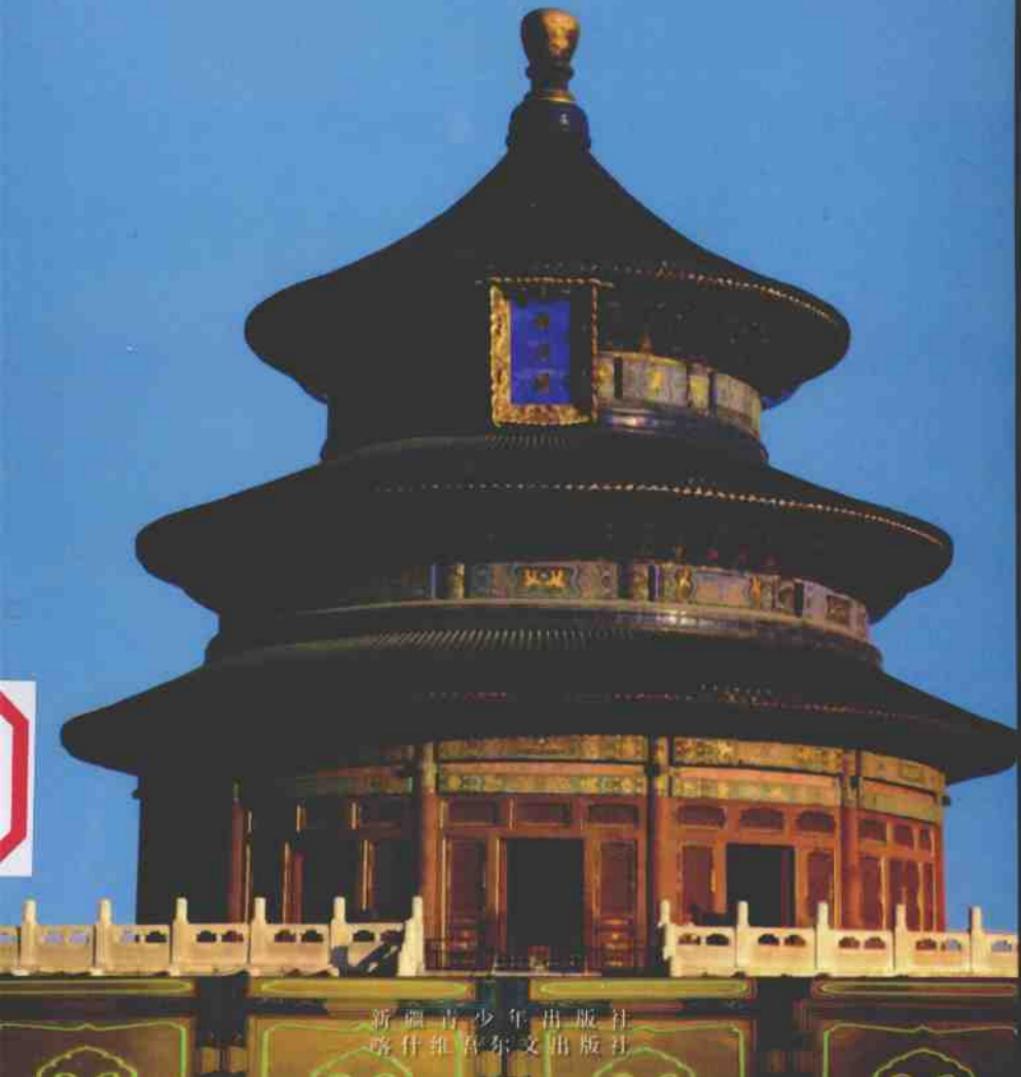


Wu Shi Feng Jing Xian

文 史 风 景 线

清仁宗颙琰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C49
74
:2

文史风景线

清仁宗颙琰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风景线 / 王卫国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 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5.12

ISBN 7-5373-1465-9

I. 文... II. 王... III. ①文学—通俗读物 ②历史—通俗读物

IV. ①I-49②K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60578 号

文史风景线

清仁宋顾琰(下)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 1600 字数: 3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5373-1465-9 总定价: 3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。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。

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。知识的增长，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。

文学，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，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；历史，能够传播历史文化，提高人的历史素养，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，塑造人的健康人格，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。

21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，应该互相渗透，有机结合，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。
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，为了贯彻素质教育，充分体现国家的“教育要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思想”，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，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、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——《文史风景线》。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，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、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、外国文学精粹、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

学大师的作品介绍。内容翔实，涵盖了古今文化、历史的各个方面；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学术性兼备；语言准确、生动、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，适合广大学生阅读。

在编写过程中，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，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，为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。

编 者

目 录

第六章	厉行禁矿 严限移边	1
第七章	清剿义军 缓靖海盗	28
第八章	农民起义 震撼清廷	94
第九章	勤教严管 徒事虚糜	196
第十章	秋狝木兰 猝然驾崩	212

第六章

厉行禁矿 严限移边

在人口过剩、耕地不足、地力有限、盲流群体到处充溢、社会经济已陷入困境的情况下，要使社会经济获得新的生机，就必须突破传统的“重本抑末”政策的束缚，通过大力开化工矿资源，吸收和消化愈来愈多的剩余劳动力，使他们获得新的就业，并为社会创造财富，给经济发展以

文史风景线

新的活力。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确非易事，就拿清王朝来说，从康熙朝开始，廷内廷外、上上下下，就一直围绕着“禁矿”还是“开矿”，展开了长期的、反复的论争。随着论争的起伏，清朝的矿业政策也呈现着时禁时弛、禁中有弛、弛中有禁的态势。在嘉庆以前的几位帝王，他们随着时势的变化，在矿业政策上也有过多次的反复。总的来说，康熙是以禁为主，禁中一度有所松弛，说它呈现过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亦未尝不可。雍正则属强硬派，一直强调崇本禁矿，如果说他有过松动，也只能是个别例外，无碍于他厉行禁矿的大体。乾隆的矿业政策变化较大，他实行的是以开为主，开中有禁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坚持“重本抑末、本固邦宁”的势力，在总体上仍然占居上风，他们极力反对开矿的主要论点，无非是那么几个，即所谓“开矿有伤风水龙脉”、“开矿乃弃本逐末”、“开矿扰民，易滋事端”、“开矿易聚难散，难以控制”、“开矿官本难筹，商力不足”等等，而其中的核心，则仍然是死守几千年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“农本主义”，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抱着不屑

文史风景线

一顾甚至是敌视的顽固态度，并迅速作出本能的反抗。

嘉庆本来就是一个农本主义者，早在味余书室习学时，他对于“农本”这一套，就十分崇拜和向往。当时他所写的诗文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以“农本”为主题的，像其中一首起为《敦促劝农桑》的诗提到：

“为政先崇本，农桑衣食源。

資培瑞善俗，教育厚黎元。

九夏耕耘亟，三春蚕绩繁。

柔条时采伐，嘉谷殖昌蕃。

筐筥勤劬省，田畴劝课温。

織车修竹經，狹馬杏花村。

无俾女红倦，休言稼事烦。

圣朝民富足，生理自相敦。”

此诗写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当年嘉庆只有十七岁，虽说乾隆已将他内定为皇储，但他并未想到自己在日后会登上皇帝宝座，即使这样，他在诗中已明确地把“崇本”看作是为政的第一要务，可见传统的所谓“本”、“末”

文史风景线

的偏见对他影响之深。这是嘉庆嗣位及亲政后极力反对开矿的思想根源。

当然，嘉庆之厉行禁矿，还有更直接的具体原因，就是他在位期间，清王朝正处于多事之秋，国内外局势都十分动荡，所谓“苗乱”、“教乱”、“海事”等等，从未停息。对于过去历朝有关开矿问题所发生的论争，嘉庆也多少有点了解，不过他相信的是主禁派的“开矿聚盗说”，而不相信主开派的“开矿弭盜说”。这一点，在他历次颁布的有关矿业问题的上谕中，都表露得十分清楚。所以嘉庆禁矿之严厉，比起乃祖雍正，可说是毫不逊色。

嘉庆四年（1799）三月，两广总督吉庆奏称：“广东采挖攀地石碌铜斤，试办一年，额已短缺，且该处滨海临洋，多人前采，恐致滋生事端，似应亟行停止。其省局鼓铸，仍请运用滇铜。”这是嘉庆亲政后第一次接触有关矿业问题的请示。他立即批复说：“所办甚妥，所见极是。仍用滇铜，不必开采。”话虽不多，但观点鲜明，态度也很坚决，可见他对待开矿，一开始就摆出了极其严峻的态势，因为

文史风景线

他所害怕的就是“滋生事端”。在这里应该指出，广东省在乾隆初年获得开发矿业的权利，本来是来之不易，是当时两广总督鄂弥达会同巡抚杨永斌，带头向顽固守旧的禁矿派发起了猛烈冲击的结果，这在我国矿业史上有“鄂氏三疏”之称，从而使广东成为继云南之后经廷议获准全面开发矿业的省份。可是嘉庆刚亲政，便将这一可喜的势头压下去了。自此以后，嘉庆便在矿业政策上不断倒退，变得愈来愈顽固和僵化。

如果说，嘉庆停开广东石碌铜矿只是寥寥几句批语，具体想法还未有充分披露的话，那么事隔不到一个月，他禁开邢台银矿的上谕，讲得就十分具体了。嘉庆四年（1799）四月，宛平县民潘世恩、汲县县民苏廷禄呈请在直隶邢台境内开采银矿，该项呈请是通过宗室、给事中明绳转递的。嘉庆在获知报告后就沉不住气了，他大加申饬说：

“朕恭阅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，于开矿一事，深以言利扰民为戒。圣训煌煌，可为万世法

文史风景线

守。朕每绎思庄谕，志之于心，因无人以此陈请，未经明谕。今特降旨宣示，使知朕意。夫矿藏于山，非数人所能采取，亦非数月所能毕事，必且千百为群，经年累月，设立棚厂，凿砂煎练。以谋利之事，聚游手之民，生衅滋事，势所必然！纵使官为经理，尚难约束多人，若听一二商人集众自行开采，其弊将无所不至！此在边省犹不可行，而况地近大名？该处向有私习邪教之人，此时方禁约之不暇，岂可听其奸众？且国家经费，自有正供常赋，川陕“余匪”，指日即可殄平，国用本无虞不足，安可穷搜山泽，计及锱铢？潘世恩、苏廷禄自因现在开捐，揣摩迎合，觊觎矿苗，恶擅其利，乃敢藉纳课为词，以小民而议及帑项，实属不安本份。俱著押送本籍，交地方官严行管束，毋许出境滋事。至给事中明绳，若系巡城，只当听断词讼，遇有比等呈词，亦应饬驳，况伊并非巡城，且系宗室，今以开矿事冒昧转

文史风景线

奏，明系商人嘱托，冀幸事成分肥，殊属卑鄙。

朕广开言路，非开吉利之路也。聚敛之臣，朕断不用。明绳折著掷还，并交部议处。”

嘉庆的这一上谕，其实有点自欺欺人。他拉大旗作虎皮，先抬出乃祖雍正的硃批谕旨去吓人，说什么“圣训煌煌，可为万世守”。不错，雍正确曾下过许多有关禁矿的硃批谕旨，而且是愈禁愈严，但即使这样，雍正也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，有时也有某些灵活和松动。像雍正二年(1724)九月，他给主张开放矿禁的两广总督孔毓珣的覆谕就是一例。他一方面坚持认为“养民之道，惟在劝农务本”；开矿“今日有利，聚之甚易，他日利绝，则散之甚难”；“朕富有四海，何藉于此”。但另方面又说：“因悯念穷黎，谕尔酌量令其开采，尔等揆情度势，必不至聚众生事，庶或可行。”雍正六年(1728)十二月，广西巡抚金鍊奏请于桂林府属漓江等处矿区，召本地殷实商人，自备资本开采，所得矿砂，三分归公，七分给商；梧州府属之芋葵山产有金砂，请另委员办理；又粤西贫瘠，铜器稀少，如开采

文史风景线

清仁宗颙琰（下）

得铜，并请价买，以供鼓铸。部议“均应如所请”，雍正亦从之。这些都说明了雍正的硃批也不全是一个调门。退一步说，雍正对开矿果真是完全禁绝，也不能说嘉庆的依据完全有道理，因为雍正的硃批谕旨是“圣训煌煌”，难道康熙、乾隆的硃批谕旨就不算“圣训煌煌”？雍正的话，“可为万世法守”；康熙、乾隆的话就不可“万世法守”吗？特别是乾隆，他在即位后便大大修改了雍正的禁矿政策，在两派官员关于矿业问题的论争中，往往支持主开派的意见，甚至主动表明，即使在皇陵、行宫附近也准许开矿。他曾下谕说：“古北口外、三道沟等处请开煤窑，朕只期于地方兵民实有裨益。至于行宫，不过暂时巡幸之所，有无妨碍，不必议及。”乾隆九年（1744）七月，那苏图受命任两广总督，乾隆就在他到任的奏折里批示说：“两粤开采一事，颇为目下急务。盖不开采，铜斤何由得裕。”总之，鼓励开矿的“圣训”并非没有，只是在嘉庆看来，雍正的“圣训”，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和需要，于是顺手拿来，作为厉行禁矿的一个法宝罢了。

文史风景线

自此以后，嘉庆所发的禁矿谕令便接连不断。嘉庆四年(1799)十二月，以“山西煤窑，最易藏奸”，命顺天府会同巡按、布政使、按察使等同步军都统查拿，按律治罪。嘉庆六年(1801)三月，大学士、伊犁将军保宁和伊犁领队大臣松筠等，联衔奏请开采新疆塔尔巴哈台所属各处金矿。军机大臣根据嘉庆一向的禁矿宗旨，即行议驳。嘉庆自然认为“所驳甚是”，并下谕指斥说：该处金沙，过去严行禁采，尚恐不免有偷挖之弊。今若官为开采，势必招集多人，奸良莫辨，并恐内地甘凉一带游民，纷纷踵至。此等无藉之徒，聚之甚易，散之则难，于边地殊有关系。仍著保宁将产金处所严行封禁，勿令偷挖滋事。其实此事之主见是出自松筠，他对于嘉庆的禁矿政策，一向持有不同的意见，在任陕甘总督时就曾上疏说：“贼不患不平，而患在既平之后，请弛私盐、私铸之禁，俾余匪散勇有所谋生。”可见松筠是把开发矿业作为解决流民群出路的，实质就是主张“开矿弭盗说”。嘉庆“以其言迂阔”，置之不理。但松筠赴京觐见时，仍坚持己见，这便激怒了嘉庆，本来是准备任命松筠

文史风景线

为伊犁将军的，但由于松筠“不听话”，遂将他降为副都统，只授以伊犁领队大臣。谁知松筠到新疆后又出新招，怂恿保宁请开金矿，这大概是嘉庆意料不及的。不过在嘉庆的眼里，松筠毕竟还是个人才，所以只好再申饬一番，也算是不为已甚吧。

嘉庆六年（1801）九月，步军统领明安具奏：大兴县民张士恒等呈称，平泉州属四道沟、云梯沟等处，有铜苗透出，请自备资本开采。原铜是铸造钱币的主要材料，仅官局的需要量就很大，一向属于求大于供的紧缺物资，因而即算在矿禁最严的时候，对于申请开采铜矿，也大多能网开一面，给予恩准。但嘉庆连采铜也堵得严严的，他批示“其事断不可行”。列举的理由还不少：第一，盖开采俱系无业游民，攒凑资本，互相邀集，趋利若鹜，倘已聚集多人，而铜苗渐竭，彼时何以遣散，岂不滋其滋生事端？这虽然是老一套的说法，亦即所谓“易聚难散”说和“开矿滋事”说。第二，即或开采获利，而该处地方与蒙古山场相连，使蒙古等以为内地官民专为牟利，有失国体。这种说

文史风景线

法虽然把问题提高到“国体”的高度，但究其实则是似新实旧，无非是所谓“反对官利”以及该地特殊。第三，现在户、工两部鼓铸所需铜斤，照例由滇运京，尽属充裕，无须另筹开采。这更是一种毫无远虑的短期行为，试想以云南一省的原铜，怎能长期满足全国鼓铸的需要，事实证明，稍后云南原铜缺额，自然不足鼓铸之用。嘉庆在列举了这些理由后，遂下令将“所有平泉州属四道沟、云梯沟等处产铜山场新旧洞口永远封禁，不准开采”，并“责成地方官严加查察，毋许再有私行偷挖之事”。此外，嘉庆还藉所谓“官利”问题，标榜自己，责斥别人，说什么“朕自亲政以来，屡谕臣工不准官利，然确信朕言者固多，心存观望者亦不少，不以朕为贤君，而视为好货之主”。为了证明他确非“官利”和“好货”，还举例说，上年直隶总督胡季堂奏请在大名地方开设铅厂，即不准行。可是明安却一再上疏“官利”，在本年内先是奏请开发木材，现又请开铜矿，“必系轻听属员怂恿，冀图沾润”。结果，明安的步军统领职务，命“革职留任”，其余所管正红旗蒙古都统及三